《商王庙号新考》、《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》、《殷礼中的二分现象》三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，彼此间的内容相互补充。

《商王庙号新考》是基础性的部分，作者在是文中，根据商王庙号在系谱上的分布规律，大胆而极富想象力地提出了一些极其新颖的看法。作者自诚这是“大胆的假设”、“不很成熟的看法”，不错，但也正是这样一种猜想，在史料不足证的情况下，给出一种逻辑通顺的解释，极能展现历史学的想象力在。当然，在确凿的证据出现前，我们不能肯定作者的猜测是必然正确的，但作为一种逻辑自洽的历史解释，值得关注并作为可能解释的一种加以理解。

作者的基本建议是这样的：商代政权为一个子姓的王族所掌握，在仪式上分为十个天干群；十个天干群彼此结合分为两组；殷商王位继承的规则为，王位不在同一天干群内传递，传弟同组、传子异组；国王掌政，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大臣会议协助；王族内的男子只要符合：健康和心智胜任、属于合适的世次、不在现王的天干、其母来自王族，便有做继承人的资格；王族内婚，十个天干群亦是外婚单位。

作者立论的依据，除了商王谱系和甲骨卜辞等考古资料之外，也不无借鉴周代的昭穆制，注意到商王庙号与其或有互相发明之处。《商王庙号新考》是立论之文，《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》则是佐证之文。作者在已经提出的假设基础上，为之添加新的证据，进一步肯定假说的合理性。作者将新发现的材料，即王亥与伊尹的祭日，放到了前述的规则之下解释，发现合若符契，“把这个新的解释从可能性提高到史实”。

《殷礼中的二分现象》仍是对上述假设的进一步佐证。作者回顾了殷礼文献资料中的二分现象，即殷礼可被分为两个又差异的组。作者考察的内容包括卜辞、殷青铜器的装饰美术，其中皆能发现存在鲜明的“二分”现象，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似乎是贯穿在殷代文物制度各方面的一种现象。作者认为，这一二分现象很有可能与前述的殷代“昭穆制”有密切关系；类似的二分现象，也见于波利尼西亚等古代文明、原始民族；殷礼中的二分现象或许与中国一般的二元观念有所牵涉；作者最后的提议，是中国古史的研究，必须要依靠考古、历史、社会、人类学等诸学者的分工合作，不能专从某一学科（或者说某一固定的视角）来讨论，此正是所谓“通业”的历史研究。